

王明蓀主編

古代歷史文化

研究
輯刊

四編 第十四冊

唐代江西地區開發研究

黃玫茵著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古代歷史文化

研究
輯刊

四 編

王 明 蓀 主編

第 14 冊

唐代江西地區開發研究

黃 玫 茵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唐代江西地區開發研究／黃玫茵 著 — 初版 — 台北縣永和市：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0〔民 99〕

目 2+172 面；19×26 公分

（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編：第 14 冊）

ISBN：978-986-254-234-7（精裝）

1. 經濟史 2. 唐代

552.294

99012977

ISBN - 978-986-254-234-7



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

四 編 第十四冊

ISBN：978-986-254-234-7

唐代江西地區開發研究

作 者 黃玫茵

主 編 王明蓀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市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電子信箱 sut81518@ms59.hinet.net

初 版 2010 年 9 月

定 價 四編 35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55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唐代江西地區開發研究

黃玫茵 著

作者簡介

黃玫茵，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。現任職私立元智大學通識教育中心、私立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。研究領域：隋唐五代社會史、中國法制史。

提 要

本書從交通、州郡戶口、經濟、人文等面向考察唐代江西地區的開發。

江西地區在其發展歷史中，一直以地理位置、交通路線受重視。隋唐時代政治中心在北，在唐代前期只重視江西通嶺南的交通重要性；唐代後期，中央財賦倚重東南八道，才開始重視江西地區的經濟發展，進而使農業、商業更形發達。

唐代後期江西人文發展，乃以經濟發展為基礎。更多人因此得以脫離經濟生產而投入讀書應舉行列。進士的大量出現，除了得力於經濟基礎外，書院教育的發達，南來的著名士子文人與南下官員亦帶來文化刺激。文風昌盛，士子習業應舉遂成風尚。

唐末五代的江西地方領袖以辟召幕僚、薦舉士子吸收外地人才，為宋代儲備更多人才，成為宋代江西高度人文發展的基礎。宋代江西文士在政治界、文學界、史學界、思想界等領域表現傑出，並有科舉世家。



目 次

緒論：問題所在	1
第一章 地理環境	11
第一節 水系地形	11
第二節 建置沿革	15
第三節 交通路線的發展	26
第二章 州郡戶口	45
第一節 戶口變化	45
第二節 州縣變動	51
第三章 經濟發展	63
第一節 農 業	63
一、糧食作物	63
二、經濟作物	74
第二節 工商業	80
一、稻米交易	80
二、漁 業	81
三、食品加工業	82
四、紡織業	83
五、造船業	85
六、林木加工業：竹編、造紙	87

七、陶瓷業	88
八、礦冶業	89
第四章 人文發展	93
第一節 教育事業	93
第二節 科舉進士	108
第三節 江西與外界的政治人文關係	125
一、州郡刺史	125
二、江西幕僚	132
三、江西文士	134
結 論	139
主要參考書目	141
附 圖	
附圖一 唐代江西地圖	157
附圖二 唐代江西簡圖	158
附圖三 唐代江西人文圖	159
附圖四 唐代藩鎮圖	160
附圖五 唐代十道圖	161
附圖六 唐代江西地區貞觀以後縣邑總數變動圖	162
附圖七 唐代江西地區貞觀以後增設縣邑分布圖	163
附 表	
表 2-1-1：唐代江西地區戶口總數表	46
表 2-1-2：唐代江西地區轄州戶數年增率表	47
表 2-2-1：唐代江西地區轄州戶數、縣數表	51
表 2-2-2：唐代江西地區貞觀以後增置縣邑表	53
表 2-2-3：唐代後期江西地區縣邑升級變動表	58
表 3-1-1：唐代江西地區水利工程表	70
表 3-2-1：唐代江西地區金屬礦產分布表	90
表 4-2-1：唐五代江西地區詩文作者分布表	109
表 4-2-2：江南道進士分布表	117
表 4-2-3：唐代江西地區進士登科表	118
表 4-3-1：江西七州刺史升降表	126
表 4-3-2：江西七州刺史升貶分期表	127
表 4-3-3：江西州刺史轉任使職表	131
表 4-3-4：江西州刺史轉任使職時間分布表	131

緒論：問題所在

拙稿所以取唐代江西一地作為研究主題，是基於以下幾點思考：首先，在唐代後期的南方開發過程中，江西在戶口、經濟、人文等方面均呈現高度的發展，其開發速度明顯地勝於其他地區。當時的江西並未如南朝時受到中央重視，在唐朝前期僅在州縣戶口方面有發展，何以在唐朝後期突然能有快速、多方面的發展？其次，唐代江西的人文發展，在各方面的發展中是最突出的。唐之前，江西的人文基礎相當薄弱，出身該處的人才很少；唐代後期該地不但進士數居全國第三，並有狀元二人，大量進士在唐代後期登場的原因何在？再次，唐代江西的發展成果對宋代江西地區有何影響？藉此說明宋代江西人文高度成就的由來。拙稿即擬以此三主題為中心，討論唐代江西地區的開發。

拙稿所討論的江西地區並非唐代的江南西道，而是現今江西省的範圍，這個區域在唐憲宗元和時期正是江西觀察使的轄地，共轄八州三十八縣。唐代江南西道包括甚廣，含有今江西省、湖南省、安徽省的唐代宣州地區及湖北省的唐代鄂州地區；江西與湖南極相似，各有其向心狀水系、環省山嶺、T字形交通幹道及通五嶺要道，二者地形各自獨立，無法劃為同一地理區；安徽之宣州地區，屬於軍事要地，時為兵家所爭，所以在地理形勢與歷史發展上都與江西大不相同。基於此故，拙稿乃取江西一地作為探討對象。江西地區的行政區劃，秦代設有艾（今修水等地）、番（今鄱陽、餘干等地）、南野（今大庾、南康等地）三縣，漢代設豫章郡，下轄十八縣，東漢加置三縣，三國吳時分屬荆、揚二州，西晉設江州統轄江西全境七郡，南朝區劃大增，混亂不可考，隋代設豫章、潯陽、鄱陽、臨川、南康、廬陵、宜春七郡，而

奠下今日江西地區的雛型，只不含玉山、婺源二縣。唐代江西地區設洪、江、饒、撫、信、袁、吉、虔八州。宋代雖將江、饒、信三州劃為江南東道，但仍以餘下五州為主體，置江南西道，保有江西地區的基本規模。歷代對江西的開發，以鄱陽湖至贛江之南北交通線為主軸，依交通線（主要是水系）向淺山丘陵地帶開發。若比較歷代開發方位，唐代以前，北部湖區平原的開發程度高於南部山區；至於東西周圍山地，雖在地理形勢上屬江西地區，但進行大規模、大面積的開發，大約要等到明清時期。

爲了涵蓋經濟開發、人才崛起二種現象，本文使用「開發」一詞，意爲以某集團（國家）爲中心，有系統地進行規畫拓展。固然在江西地區的發展上，不全是由國家政府出面主導，但不可否認的是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相當有影響力的角色。除了權力核心、官僚體系可培養吸收人才外，國家在交通整備、勞力運用、貨品專賣制度以及軍事擴展行動等多方面也是深具影響力的主體。縱使江西遠離兩京的權力核心，但是中央權力對江西而言，不只是政治主體，同時也是經濟主體。唐朝後期，江西的地方官對江西地區的建设頗有建樹，尤其興築水利，直接造成糧食增產，間接促成文人士子增加。唐玄宗開元四年（716），張九齡於大庾嶺開闢通往嶺南的新道路，使江西地區重要性大增。江西原有舊路通往嶺南，因狹窄難行，多爲軍事需要才使用。其他南北經濟運輸，需借重湖南郴州之路，但郴州水陸交通不便，風險頗高。長江中游本來就是東西交通樞紐，自從此一通往五嶺的新路出現，南北運輸可改由大運河連上新路，江西地區遂發展成爲東西南北四方交通彙集所在，與其他地區的聯繫也因此加強。

唐代中葉以後，東南半壁江山的重要性大增。據《唐會要》卷八十四〈雜錄〉記載元和二年（807）十二月，史官李吉甫等撰上《元和國計簿》十卷，可知江西已是賦稅重要來源之一，其曰：

總計天下方鎮，凡四十八道，管州府二百九十三，縣一千四百五十三，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。每歲縣賦入倚辦，止于浙西、浙東、宣歙、淮南、江西、鄂岳、福建、湖南等道，合四十州，一百四十四萬戶。比量天寶供稅之戶，四分有一。

東南八道東西以長江爲幹道，南北倚重嶺南—贛水—鄱陽湖—長江—大運河連成的南北交通大動脈。江西地區爲四方交通樞紐（見附圖四：唐代藩鎮圖），形成經濟文化上的重要特點。愚意以爲由區域經濟、地方文化的角度來考查

江西開發歷史，較能突顯其特點。

江西一地，自唐代中期至五代，發展的速度極快，其他地區難以匹敵。若以鄱陽湖區平原與贛江水系兩岸為範圍，由唐末到五代，此範圍內耕地面積擴大，糧食產量增加，進而造成農產品商品化、經濟作物栽植大增的現象。由此，引出製茶、造紙、麻織、製糖、釀酒等加工手工業的發展；傳統工業如礦冶、鑄錢、陶瓷、竹木等也隨之發達。農業商品化、手工業多樣化的日趨成熟，導致商品交換頻繁、市場擴大、墟市、草市增加及新的商業性城市出現。在這些基礎支持下，文化事業日漸發達，尤其教育事業發達，知名文士、貢舉及第人數增加。整體的表現就是江西地區的地域性優勢。因此，拙稿希望從江西地區開發過程中，理解中央與地方的互動方式，以及江西地區在該過程中所呈現的特色。

對於上述課題，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，或著重江南全域，或偏重宋代江西地區，對唐代江西地區似較少著墨。對於江西地區已作特定問題之探討者，大致有如下三方面：

一、聚落與交通發展

聚落、交通與人口三者有密切關係，戶口增加導致舊市鎮擴大、新市鎮出現、新交通線形成，同時，交通線所到之處又帶來人群，幫助聚落發展。學界對此三主題各有探討。

戶口方面，唐代江西地區戶口數的增加是學界承認的事實，從唐朝後期至宋初全國戶口普遍減少，江西地區反而上升。學界多認為戶口激增的原因是北人大量南遷的影響〔註1〕，但牟發松主張移民只是短期性促成人口增加，江西地區自身人口發展條件成熟才是主因，故其增加趨勢能一直持續到宋代。就戶口增加所產生的影響而言，凍國棟、蕭高洪、周兆望等人均指出戶口增加直接影響到州縣升級、縣邑增置〔註2〕；韓國磐、牟發松、蕭高洪等

〔註1〕參看許懷林《江西史稿》（南昌：江西高校出版社，1993年5月），頁120～122。牟發松《唐代長江中游的經濟與社會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89年1月），頁267～272。杜文玉氏〈唐五代時期江西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〉，頁103～104。蕭高洪〈唐五代北人遷贛及其社會效果〉（《江西社會科學》1992年第六期），頁125～127。凍國棟《唐代人口問題研究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2月），頁304～305。

〔註2〕參看周兆望〈六朝隋唐時期鄱陽湖——贛江流域的經濟開發與持續發展〉，頁28。蕭高洪〈前引文〉，頁127～128。凍國棟《前引書》，頁127～128。韓國

人認為戶口增加是經濟發展的基礎；佐竹靖彥以陳氏義門移居南方後在地方擴展勢力的過程，說明唐宋變革期土地所有型態的轉變〔註3〕，頗值得參考。百姓大量移居江西，除因戰亂逼迫而外，其與當地生活條件改善應有一定關聯。牟發松重視江西自身的有利因素，予人啓發良多，此事有待更進一步研究。

聚落與城市方面，江西地區州縣升級、縣邑增設的現象相當明顯，其因一般認為人口增加是主要原因〔註4〕。但對使職的升級，伊藤宏明氏認為只是為了平亂，並非重要性增加，所以亂平即降回觀察使；許懷林認為江西觀察使升為鎮南軍節度使時，其控制範圍已擴及江南〔註5〕。對非正式政區的草市，牟發松、傅宗文兩位認為另有成因，主要來自商業經濟發展、坊市中邸店有限、貨物過多而形成草市；凍國棟則認為交通也有相當程度關聯〔註6〕。市鎮分布方面，牟發松、鄭學檬、曾維才等人指出江西地區新縣傾向分布於新開發山區和濱水地帶，尤其淺山丘陵地帶最多，意味著開發方向朝山區深入〔註7〕。移民之事，造成舊市鎮擴大、新市鎮出現，除代表開發程度提高外，中央勢力是否隨之深入、抑或以社會力為開發主力，值得再深入。

交通方面，江西地區是四方交通彙集所在，開通大庾嶺新路確立其重要性。對於大庾嶺路的據點、路線延伸、連結區域，學界有詳細分析〔註8〕。江

磐〈唐代江西道的經濟和人文活動一瞥〉，頁79～81。

〔註3〕參看韓國磐〈前引文〉，頁81。蕭高洪〈前引文〉，頁128。佐竹靖彥〈唐宋變革期における江南東西路の土地所有と土地政策〉（《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》，京都：同朋舍，1990年2月），頁336～339、344～345。

〔註4〕參看許懷林〈前引書〉，頁115～117。牟發松〈前引書〉，頁293～296、300。凍國棟〈前引書〉，頁296～300。杜文玉〈前引文〉，頁103～104。

〔註5〕參看伊藤宏明〈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江西地域の在地勢力について〉（《中國貴族制社會の研究》，川勝義雄、礪波護編，京都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1987年），頁280。許懷林氏〈前引書〉，頁117～120。

〔註6〕參看牟發松〈前引書〉，頁185～192、202～204。傅宗文《宋代草市鎮研究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9月），頁12～15。凍國棟〈唐代長江下游地區的開發與市場的擴展〉（收入《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開發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1989年8月），頁236～237。

〔註7〕參看牟發松〈前引書〉，頁296。鄭學檬〈論唐五代長江中游經濟發展的動向〉，頁114～116、117。曾維才〈試論贛江流域在客家民系形成中的地位〉（《江西社會科學》1992年第二期），頁94～95。

〔註8〕參看曾一民《唐代廣州之內陸交通》（台中：國彰出版社，民國76年），頁3～65。蔡良軍〈唐宋嶺南聯繫內陸地區交通路線的變遷與該地區經濟重心的轉移〉（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》1992年第三期），頁36～38。胡水風〈繁華

西地區除鄱陽湖——贛水——大庾嶺——嶺南一交通主線外，其他河川也是重要交通線。沈興敬、許懷林等人指出憑水路加上部份陸路，江西地區可直接通達閩、浙、皖、湘、粵五區，各河川皆有其作用，如昌江運茶、樂安江運銀〔註9〕。唐代江西地區交通線發展的原因，牟發松認為唐代增設橋樑、津渡、驛站有助於交通線連結，但交通以軍政作用為主，只是連帶促進商業發展；青山定雄、許懷林、沈興敬等人認為早期江西地區航運以軍事目的為主，但隋唐時江西地區航運與貿易的發展才是交通運輸性加強的主因〔註10〕。在整個江南交通體系中，江西與湖南為中央樞紐，江西對南聯絡還較湖南便利，該地區交通的特色在其聯繫性強。其交通狀況不只因自身發展而改善，也與四方聯繫的需要密切相關，後者的影響力絕不遜於前者。在整個大環境中，江西地區交通的特色仍有待探討。

二、經濟發展

學界對江西地區的經濟，咸認為較前代有明顯進步。大致以水利建設及農工商業二主題為探討主題。

水利建設方面的探討，認為江西一地的水利建設，在唐代後期數量大增。其型式分為堤堰、陂塘二型，前者以防洪擋水為目的，後者以蓄水溉田為目標，亦兼有調節水量的作用〔註11〕。對於水利建設大增的現象，牟發松以為出於農業集約化的壓力，也與地方財源豐富有關；許懷林則認為與汲水工具的運用相關，目的在使高於河岸的地帶能得到灌溉〔註12〕。水利建設分布的地區，王根泉、魏佐國認為江西全區都需要水利，平原及低窪地區用以防洪，

的大庾嶺古商道》（《江西師範大學學報》1992年第四期），頁60～61。牟發松氏《前引書》，頁212～213。青山定雄〈唐代的陸路〉（《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》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1969年8月），頁8～11。

〔註9〕參看沈興敬〈隋唐宋元時江西航運的全面發展〉（《江西內河航運史》，北京：人民交通出版社，1991年8月），頁29～30、36～38。許懷林〈舟船之盛，盡於江西——歷史上的江西航運業〉（《江西師範大學學報》1986年第三期），頁16～17。

〔註10〕參看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218～219。沈興敬〈前引文〉，頁26、36～41。許懷林〈宋元以前鄱陽湖地區經濟發展優勢的探討〉（《江西師範大學學報》1986年第三期），頁6～7。

〔註11〕參看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75～91。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122～105。曹爾琴〈唐代經濟重心的轉移〉（《歷史地理》第二期，1982年），頁152。杜文玉〈前引文〉，頁104。

〔註12〕參看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78～83、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125～126。

丘陵山地藉以灌溉；許懷林、牟發松以分布表顯示水利工程集中於贛北與州治所在，分布並不平均；許懷林指出，可能是因贛南森林多，水土保持佳，水害不嚴重〔註 13〕。而建設水利者，韓國磐、牟發松、施由民認為大多數水利工程在官方（地方官）指導下完成；詳細方式是全由官方進行或官雇民進行，王根泉、魏佐國則認為限於史料不能確定〔註 14〕。水利建設的影響，韓國磐、牟發松認為能夠促進農業經濟發達，施由民認為間接有助於文化教育推廣〔註 15〕。對於水利建設的現象，學界的整理相當完善，唯對於「人」在水利建設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仍有不明之處。

農工商業方面，學者多注意到江西地區大量的物產資料，例如農作物除米、麥外，也包括麻葛、水果、茶葉等，手工業有紡織、礦冶、陶瓷、製茶、造船等多項，商業以茶商、木材商為最大宗〔註 16〕。稻作的增產與新品種傳入、牛耕的運用、鐵製耕作工具的應用及稻麥複種制的採用相關〔註 17〕。許懷林、鄭學稼、牟發松另提出水利造成田畝增加也是一因素〔註 18〕。對於農業變化的影響，牟發松認為糧食產量升高使農民有餘糧外銷，有餘田改作經濟作物，追求更高的利潤，其中以茶為最大宗。茶葉已成外銷商品，有專業茶商出現，專門到江西地區買茶〔註 19〕。對農業商品化的現象，牟發松認為在唐代只算是有此傾向，並未提升到全面商品化；凍國棟認為商品已達普遍

〔註 13〕 參看王根泉、魏佐國〈江西古代農田水利芻議〉（《農業考古》1992 年第三期），頁 176。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 125。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85～91。

〔註 14〕 參看韓國磐〈前引文〉，頁 81。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89～90。施由民〈自唐至清南昌地區的水利〉（《農業考古》1992 年第三期）。王根泉、魏佐國〈前引文〉，頁 176～180。

〔註 15〕 參看韓國磐〈前引文〉，頁 81。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83、90～91。施由民〈前引文〉，頁 187。

〔註 16〕 參看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98～104、129～134、146～180。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 130、132～145、149。韓國磐〈前引文〉，頁 81～84。杜文玉〈前引文〉，頁 104～107。鄭學稼〈前引文〉，頁 119～122。凍國棟〈前引文〉，頁 228～230、232～233。周兆望〈前引文〉，頁 26～29。

〔註 17〕 參看杜文玉〈前引文〉，頁 104～105。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93～97。文士丹〈東吳——南宋時期江西的農業科學技術〉（《農業考古》1992 年第三期），頁 112～113。林立平〈唐代主糧主產的輪作複種制〉（《暨南學報》1984 年第一期），頁 45～47。

〔註 18〕 參看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 124～125。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83。鄭學稼〈前引文〉，頁 118。

〔註 19〕 參看鄭學稼〈前引文〉，頁 120～121。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131～134、136～139。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 132～135。

化，集市不足以銷貨而採直接運銷方式，將商品圈擴大到江西地區以外的地區；鄭學檬認為江西地區商業發達，除輸出本身農工產品外，因為江南全區可互為市場，所以江西地區的交通樞紐地位可帶來大量轉運貨物〔註 20〕。學界承認江西地區的經濟發展頗快，但對於農業發達、商業興盛造成當地有何變化，似少著墨。中央與該地社會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，似可再作探討。

三、人文發展

文化一詞涵義相當廣，若將文化狹義地限定為精英人才的展現，學界的研究可分由書院、文士科舉、地方領袖三主題來說明。

書院方面，宋代江西書院聞名全國，其前身基礎奠定於唐末五代。唐代書院由私人藏書之所變為學者講學、士子求師之處，性質由圖書館變為學校。許懷林、李才棟等人均指江西書院是因應科舉考試而出現，科舉重文學輕經學，書院可符合其需要。李才棟氏並且認為在經濟發達下，出現可以不必投入經濟活動而致力求學的人；同時雕版印刷較前代普及，不需師承口授；蕭高洪則認為北方文人南遷創學，也是書院出現的原因〔註 21〕。江西地區的書院，根據嚴耕望、許懷林、李才棟等人的考察，可知有多處，最著名的是在廬山，其他也多在縣邑等交通發達的地方〔註 22〕。關於書院的作用，佐竹靖彥、許懷林、李才棟等人指出書院多私人創設，其目的在為本族子弟創造讀書條件，為應試出仕、進入官界做準備，是以家族子弟俊秀者才可就讀，並有學田供給書院開銷〔註 23〕。蕭高洪氏認為江西的書院塑造出江西的學風，宋代江西多科舉世家，泰半是唐五代移民後裔。〔註 24〕

文士科舉方面，宋代江西文士輩出，皆一時之選，在唐代已可略見端倪。牟發松、劉珈珈兩位以為中唐是江西文化地位改觀的時期，江西地區漸有名

〔註 20〕 參看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114～115。凍國棟〈前引文〉，頁 234、236～237。鄭學檬〈前引文〉，頁 119～122。

〔註 21〕 參看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 160。李才棟《江西古代書院研究》（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1993 年 10 月），頁 5～6。蕭高洪〈前引文〉，頁 128～129。

〔註 22〕 參看嚴耕望〈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〉（《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民國 80 年 5 月），頁 288～294。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 60～162。李才棟《前引書》，頁 13～28。

〔註 23〕 參看佐竹靖彥〈前引文〉，頁 318～319。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 160～162。李才棟《前引書》，頁 15、24～25。

〔註 24〕 參看蕭高洪〈前引文〉，頁 129。

士，雖未見於正史，但由其他文學總集可得知〔註 25〕；晚唐江西地區文化水準急速提升，咸通十哲居其二〔註 26〕，並有袁州詩人群出現，科舉進士人數且升高為前期九倍。造成文化快速發展的原因，牟發松、丁俊屏等人認為與北方文士南仕南遷、良吏崇儒建學有關〔註 27〕；牟發松指出科舉制度有利平民也是一因；許懷林、丁俊屏等人則強調經濟因素，對此，牟發松認為只是誘因而非成因，如饒、撫二州雖富，科舉成績卻不如袁州〔註 28〕。江西的人才在唐後期大量出現，教育與科舉是二因素，然而此二因素皆屬普遍因素，促成江西一地人才特多的其他內部成因，有待進一步分析。

地方領袖方面，唐代末期，中央控制力已不能抵達江南，黃巢之亂使江西地區與中央的聯繫斷絕，為了抵抗黃巢亂事，地方出現鍾傳、危全諷、彭玕、譚全播與盧光稠四股勢力。學界討論重點主要在這些地方領袖的社會地位，佐竹靖彥認為這四者是地方土豪，既非科舉落第者，也非日後出仕南唐的文官；中川學也認為這些鄉村土豪是鄉村土戶的代表，擁有地方經濟的支配權；伊藤宏明則主張除土豪外還包括下級官吏和商人；共同看法是這些地方領袖居於唐朝支配體系的末端，不滿中央，對地方有控制力，藉唐末地方危機而獲得統御權力〔註 29〕。在地方勢力中，少數民族的重要性是另一重點，日野開三郎主張鍾傳、彭玕皆是蠻酋；岡田宏二位主張只有彭玕才是蠻酋；佐竹靖彥、伊藤宏明對鍾傳的身份存疑，但一樣承認少數民族居鍾、彭勢力

〔註 25〕 參看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310～316、318～319。劉珈珈〈江西文壇在唐代崛起〉（《江西教育學院學報》1991 年第三期），頁 28～31。劉珈珈〈唐宋時代的江西文壇〉（《江西文化》第四章，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3 年 6 月），頁 60～68。

〔註 26〕 咸通十哲，指鄭谷、許棠、任濤、張蠊、李栖遠、張喬、喻坦之、周繇、溫憲、李昌符十人，又號「芳林十哲」。其中江西人為鄭谷、任濤。

〔註 27〕 參看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321～324。丁俊屏、曉偉〈略論唐代中後期江西文化的發展〉（《江西社會科學》1992 年第四期），頁 95～98。凍國棟《前引書》，頁 330～331。

〔註 28〕 參看許懷林《前引書》，頁 159。牟發松《前引書》，頁 327～330。丁俊屏、曉偉〈前引文〉，頁 98～99。

〔註 29〕 參看佐竹靖彥〈宋代贛州事情素描〉（《唐宋變革的地域的研究》，京都：同朋舍，1990 年 2 月），頁 364～366。中川學〈唐末梁初華南の客戶と客家盧氏〉（《社會經濟史學》三十三卷第五期，1967 年 12 月），頁 6～15。伊藤宏明〈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江西地域の在地勢力について〉（《中國貴族制社社會の研究》，川勝義雄、礪波護編，京都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1987 年），頁 301～303。

的核心〔註 30〕。伊藤宏明強調江西地區地方領袖的權力來自眾人授予，基於互信而結合，並非藩鎮的家父長式隸屬關係〔註 31〕。此外，這些地方勢力極重視文人，是另一被學界注意現象。鍾傳的統治以士人為中心，以文人官僚為統治基礎，形成日後的社會規範。江西地區地方領袖都重視學校教育，招撫流民，力求民生安定，優禮士人，與宋代江西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有密切關係〔註 32〕。相較於宋代江西文人才子輩出，唐末五代可說是宋代的人才儲備時期。唐朝中央無法掌控江西地區後，社會領袖代之而起，扮演文化發展的主導角色。其培養、吸收、運用人才，對江西一地文化水準的提升發揮何種程度的作用，有待進一步探討。

此外，江西地區的宗教方面，謝蒼霖、許懷林二位均曾撰文討論〔註 33〕。二位偏重於介紹唐代江西一地的佛道人物與寺觀，與佛道發展史較有關聯。其論述頗詳，唯並未說明與江西一地發展之關聯。

根據以上所述，歷來學界的研究，不是偏重於開發現象的敘述，就是側重個別現象的分析，至於各現象間的交互作用，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討論分析。再者，江西地區的開發研究，究竟是由國家主導？或者授權進行？或者被地方勢力滲入而取代，凡此問題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。其次，江西一地在開發過程中呈現的特殊性為何，拙稿對這些問題擬作進一步的探討。

為追隨學界前輩學者驥尾，拙稿擬分由下列四方面探討唐代江西地區的開發：（一）地理環境；（二）州郡戶口；（三）經濟發展；（四）人文發展，敬祈博雅君子、方家學者教正。

〔註 30〕 參看日野開三郎《唐末五代初自衛義軍考》（福岡：著者自刊，1984 年），頁 333～338。岡田宏二〈唐末五代宋初湖南地域の民族問題——とくに彭氏系譜と土家族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〉（《東洋研究》第七十二期）。佐竹靖彦〈唐宋變革期における江南東西路の土地所有と土地政策——義門の成長を手がかりに〉（《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》，京都：同朋舍，1990 年 2 月），頁 364～366。伊藤宏明〈前引文〉，頁 285～286、292～293。

〔註 31〕 參看伊藤宏明〈前引文〉，頁 301～302。

〔註 32〕 參看伊藤宏明〈前引文〉，頁 287～288、290～301。佐竹靖彦〈前引文〉，頁 366～367。

〔註 33〕 參看謝蒼霖〈江西宗教及其遺迹〉（《江西文化》，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3 年 6 月），頁 25～45。許懷林〈前引書〉，頁 167～199。

